

中
國

新
世
紀

新时期

文学思潮研究资料(上)

主编 孔范今
编选 路晓冰 施战军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

总主编 孔范今 雷达 吴义勤 施战军



中 国

新 时 期

文学思潮研究资料(上)

主编
编选

孔范今
路晓冰
施战军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甲 种

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

总主编

孔范今

雷 达

吴义勤

施战军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新时期文学思潮研究资料·上 / 孔范今, 施战军主编; 路晓冰编选.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6.4
(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甲种 / 孔范今, 雷达, 吴义勤, 施战军主编)

ISBN 7-5329-2424-6

I. 中… II. ①孔… ②施… ③路… III. 文学思潮—研究—中国—当代 IV. I20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30609 号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680×980 毫米 1/16
 印张/90.75 插页/6 千字/1423
印 数 1-2000
定 价 92.00 元

出版说明

发端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中国新时期文学至今已走过了近三十个年头，在这三十年里，中国当代文学的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大批优秀的作家、作品支撑起了中国文学新的天空，中国文学迅速融入了世界文学的潮流并迎来了它最为辉煌的发展时期。而中国新时期文学的繁荣也带来了新时期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的繁荣，可以说，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追踪研究一直是中国当代学术界和评论界最具生机活力的领域，并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

然而，与文学界和研究界的这种“繁荣”局面相比，新时期文学的资料工作则显得有些滞后：到目前为止，国内尚没有一套权威性的能完整反映新时期文学发展全貌的文学大系，也没有能够全面反映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历程和整体成就的系统资料汇编。这无疑为我们在新世纪全面展示、回顾、总结新时期的文学成就，反思新时期文学的经验教训，深化对新时期文学的研究工作带来了诸多困难和不便。

有鉴于此，我们特意邀请孔范今、雷达、吴义勤、施战军四位在新时期文学研究方面卓有成就的知名学者和评论家来主编这套《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工作能为广大新时期文学研究者提供第一手的权威研究资料，同时也为他们提供在资料查找和检索方面的便利，从而为推进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走向深入和突破做出贡献。我们力求做到：一，全面系统地展示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的成就和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的现有水平；二，为全面客观地评价和认识中国新时期文学提供科学的参照和理论的依据；三，全面梳理、呈现和总结中国新时期文学的研究历史和研究脉络。

本套丛书分为甲、乙两种：甲种是关于中国新时期文学思潮、流派、

文体等方面的综合研究资料汇编，乙种是中国新时期代表性作家的个人研究资料汇编。每卷除精选各个领域最优秀的研究成果外，还将以附录方式展现相关研究成果的整体索引。本套书采取开放的体例，并将长期出版下去，我们希望把它打造成一个重要的学术工程。我们的目标是资料的系统性、学术的科学性、观点的多元性、筛选的权威性并重，力争能使广大读者既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有一个全面、客观的认识，又能以最快捷的方式读到中国新时期文学最优秀的研究文章。

目 录

根植在生活的沃土中	刘心武 (001)
关于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艺术问题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九日在广东省文学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周扬 (008)
为文艺正名	
——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	本刊评论员 (030)
“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个科学的口号	吴世常 (039)
重放的鲜花	左泥 (045)
思想要解放，创作得繁荣	曹禺 (048)
“歌德”与“缺德”	李剑 (051)
“现在还是放得不够”	阎纲 (054)
关于“向前看文艺”	洁泯 (058)
也谈歌颂与暴露	夏康达 (060)
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	邓小平 (064)
解放思想 要用思想	秦兆阳 (070)
文艺要为政治服务	敏泽 (076)
要善于刻画人物的灵魂	周介人 (085)
文学的新时期	朱寨 (088)
新的课题	
——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	公刘 (106)
新诗与现代化	

- 在诗歌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 徐 迟 (112)
关于新诗发展问题的一封信 公 木 (116)
令人气闷的“朦胧” 章 明 (124)
不可忽略形式及其规律
——兼谈新诗的“朦胧” 汪 政 三 义 (130)
时刻牢记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
——关于《崛起的诗群》的自我批评 徐敬亚 (136)
自欺的“光明”与自溺的“黑暗” 郑 敏 (140)
先锋诗的“多事之秋”：世纪末的论争和分化 罗振亚 周敬山 (143)
- “意识流”是什么? 袁可嘉 (157)
现代主义和“意识流”
——从两篇小说运用的艺术手法谈起 李 陀 (161)
小说出现新写法
——谈王蒙近作 阎 纲 (170)
对一些文学观念的探讨 王 蒙 (179)
打破传统手法 李 陀 (184)
广收博采，推陈出新 宗 璞 (187)
意识流文学东方化过程 宋耀良 (189)
- 创作通信 李 陀 乌热尔图 (201)
我的根 郑万隆 (210)
文化制约着人类 阿 城 (214)
跨越文化断裂带 郑 义 (218)
理一理我们的“根” 李杭育 (220)
“文化意识”和文学“寻根” 缪俊杰 (226)
野蛮与文明：批判与张扬
——当代小说中的一种审美现象 蔡 翔 (232)
“文化”的尴尬 李杭育 (243)
从“寻梦”到“寻根”
——关于近年文学变动的札记之一 李书磊 (249)

文化“寻根”与“寻根文学”

- 评一股文学潮流 吴秉杰 (262)
寻根：回到事物本身 李庆西 (271)
寻根文学：更新的开始（1984—1985） 李洁非 (287)

通向“更加丰满”的路

- 关于新时期小说创作借鉴西方现代文学断想 董之林 (307)
中国近年小说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 季红真 (317)
关于“伪现代派”及其批评 黄子平 (334)
也谈“伪现代派”及其批评 李陀 (345)
中国与现代主义：十年新经验 袁可嘉 (356)

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 鲁枢元 (370)

新时期文学要警惕进一步“向内转” 周崇坡 (376)

文学的“向内转”与艺术创作规律

- 兼评《新时期文学要警惕进一步“向内转”》 童庆炳 (380)
“向内转”：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 与周崇坡同志商榷 杨朴 (385)
“内”与“外”

- 由新时期文学“向内转”的讨论而引发的对话
..... 潘凯雄 贺绍俊 (389)
为什么说“向内转”是贬弃现实主义的文学主张？ 曾镇南 (395)

根植在生活的沃土中

刘心武

“四人帮”大搞文化专制主义的那些年里，他们也曾抛出一些冠冕堂皇的文章，明为宣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实则篡改《讲话》。文艺与生活的关系，《讲话》论述得一清二楚；写作品要从生活出发，本已成为无需争论的常识。但是，“四人帮”从理论和实践上都推行“主题先行”，概念出发，流毒极深，贻害至今。不是吗？现在还常有这样的作品出现，内容是反映同“四人帮”斗争的，而创作路子却仍是“四人帮”“主题先行”、概念出发那一套。在深入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的斗争中，我们必须重新学习《讲话》中有关文艺与生活关系的论述，真正从生活出发，写出无愧于新长征时代的好作品。

在新长征的文化队列中，我是一员新兵。思想水平、生活功底、艺术修养、写作技巧几方面都很不足。我写的作品，发表出来能引起较多读者注意的，目前也仅仅是《班主任》这样一个短篇。

《班主任》在《人民文学》发表以后，编辑部和我陆续收到许多读者来信。这些情意真挚的来信不但有赞扬与鼓励，也坦率地对《班主任》提出了宝贵的意见。从读者的反应中我体会到，从生活出发的东西人们就喜欢，从概念出发的东西（哪怕从正确的概念出发）他们就厌弃。

不少读者热情地肯定《班主任》“写得真实”、“摆脱了帮味”，“能使人想到身边的人和事”、“感到亲切”。为什么我以前发表的作品不能获得这样的评价？仔细想来，关键在于以前或多或少总是有点从概念出发，而《班主任》却是从生活本身出发来构思的。

倘若从概念出发，《班主任》一定会是另外一副面貌。先定下个主题

——歌颂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人民教师。“主题先行”后，便来设置人物。“一号人物”不用说是个优秀的班主任了。“对立面”呢？或者安排个破坏教育革命的“四人帮”爪牙，或者安排个持错误观点的落后教师。“中心事件”呢？倘若选定“接收小流氓”，那么，故事发生在一九七五年，“矛盾冲突”便围绕着好老师要挽救小流氓，而“四人帮”爪牙却教唆小流氓来展开；故事发生在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后，“矛盾冲突”则围绕着好老师耐心，而落后老师急躁来展开。在“一号人物”旁边要陪衬上一两个好学生，在“对立面”左右则要安置一两个糊涂虫或和事佬。“高潮”要挖空心思搞个突发性场面（火灾？斗殴？车祸？……）。最后当然是“正胜邪败”的“大团圆”结局，不过，还得让“一号人物”说几句“斗争还没结束”一类的话，以示作品的“深度”。显然，这样的创作路子，仍是“四人帮”“三突出”的那一套。这是一条创作上的死胡同。以“帮味”反“帮”，不但会败坏读者的胃口，而且有可能造成反效果。

《班主任》是我挣脱“主题先行”的枷锁的产物，它有一个相当长的酝酿过程。它的主题不是事先拟定出来的，而是无数在我心中时时拱动的生活场景，大量牵动我感情丝缕的人和事，经过多次交融、剪裁、提纯、冶炼……直到构思接近完成时才初步凸现，而且直到写成后才明确起来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形象思想的过程。

我在中学担任过十几年的班主任。对“四人帮”破坏教育战线的累累罪行，我有切肤之痛，心怀深仇大恨。揪出“四人帮”后，我常常思索：中小学这种最基层的单位里，并没有多少直接同“四人帮”一伙挂钩的黑爪牙，为什么受灾的程度并不比某些被“四人帮”爪牙直接控制的单位轻呢？我从亲身经历中体会到，摧毁“四人帮”在教育战线的帮派体系虽然至关重要，却仅仅是拨乱反正的一个前提。我们还必须花大力气批判“四人帮”在教育战线散布的种种谬论，努力肃清那些潜移默化、无孔不入、渗透并玷污了不少师生灵魂的“帮毒”，才能切实按毛泽东思想体系整顿好学校。许多我教过的学生浮现在我的眼前，使我失眠，令我深思。其中就有石红、谢惠敏、宋宝琦这几种不同类型的学生。他们的状况是怎样形成的？应当怎样引导他们从现在的起点向前迈进？……丰富的生活素材经过反复的咀嚼、消化，精华便逐步浓缩成了艺术构思——我要写出“四人帮”给我们教育战线造成的内伤，我要满腔义愤地告诉读者：不要仅仅注

意到张铁生式的“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丑类，还要注意到宋宝琦式的畸形儿，更要注意到反映在谢惠敏这类青年学生身上的问题！一位业余作者对我说，反映前几年“四人帮”对学校的破坏，如果仅仅是站在校门口粗粗一望，那么，诉诸文字也不过是写写破烂的门窗、混乱的秩序；倘若能再进去转转，那么，便不难发现宋宝琦一类学生的问题，只要有足够的勇气，也不难在作品中塑造出这一类形象；但只有真正在学校里进行长时期的观察、体验，才能敏锐而准确地向读者提供出谢惠敏这样的形象。我很同意他的分析。我在学校工作时，谢惠敏这样的学生给我带来了最多的思虑，激起了我最强烈的痛惜与切望相交织的复杂感情。我总觉得他们这类青少年的进一步发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着我们祖国、我们民族的前途。因此，我在写《班主任》时，才没有停留在提出和勾勒宋宝琦的形象上，而是把笔锋深入到了更严峻的问题，以诚挚的态度向读者提供了谢惠敏这样一个在以往小说中似乎还不多见的形象。对生活的熟悉、理解程度，决定着人物形象的独特美学价值即典型化程度，因而也就决定着作品的思想深度。在构思中，我除了用“过电影”的方式反复酝酿学生形象外，脑海中还接二连三地涌现出许多老师的形象。我熟悉他们，热爱他们。其中不少优秀的班主任更是我钦慕的榜样。人们常常说到教师的辛勤、耐心、细致、以身作则，却很少深入到教师的内心，很少去发掘他们那种高度的革命责任感，那种强烈的、以特有的形式酝酿与爆发的爱和憎，那种心灵的美。于是在我的构思中，一位概括了我所体验到的革命教师的人格美与心灵美的班主任形象，便在一九七七年春天这个特定的环境中逐渐清晰、丰满、凸现出来了，这便是张俊石这个人物的诞生。后来我又从生活中提炼出了尹老师的形象。在小说中，宋宝琦、谢惠敏、尹老师都和张老师有矛盾，但他们并不是张老师的“对立面”，对立面是“四人帮”，是“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和反动的愚民政策。不少读者把小说中“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这句话认作是这个短篇的主题。我觉得可以这么来看。但我并不是先有这么个警句然后再来定人物、编故事。说实话，这个句子是直到我写那一段时，才一下子蹦了出来。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鲜的句式，为什么能打动读者？一个重要的因素，恐怕就是因为整个小说是从生活出发的，读者被有生活实感的人物和场景吸引住了，因此在看到这个句子时并不觉得突兀，而是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一些读者来信问：你说《班主任》里的人物形象是从生活中概括出来的，这个我懂，但究竟有没有具体的模特儿？我想，塑造艺术形象，总是需要具体的模特儿的。所谓提炼、概括，不能理解成仅仅是分析共性，即便写历史小说，作者在构筑历史人物的艺术形象时，恐怕也必得从现实生活中所见所闻的活人身上，汲取某些性格、气质、外貌、行为、风度方面的养料，也就是说，仍然不能仅仅从资料分析上去概括共性，仍然需要具体的模特儿。当然，模特儿或者以一个为主，或者综合数人而用之，照搬照用一般是不适宜的。有的读者去猜测《班主任》中的人物是否即某某中学的某某某，那是没有意义的。《班主任》中的人物形象固然有模特儿，但大多是综合数人而用之，并且也非简单地各取一点或数点拼凑而成。我在塑造人物的过程中，以朝典型化高度攀登为目标，提炼、熔铸，很花费了一番气力。比如张老师这个形象，为什么要塑造成这个样子？一位爱好文学的青年同我议论过。他说自己也曾打算写一篇歌颂园丁的小说。他按这样的思路设计自己作品的主人公：因为读者们对“女的好，女的都是党代表；老的坏，老的都是走资派”的“帮味”公式极端厌弃，所以确定主人公是一位五十多岁的男教师。因为要把他塑造成英雄人物，所以确定的面貌是“浓黑的剑眉，深邃的目光”……我问他：“在生活中，是否有几位五十多岁的老教师，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呢？”他摇头；又问他：“你觉得你熟识的人当中，谁的眉毛称得上是‘剑眉’、谁的目光常给你‘深邃’之感呢？”他又摇头。原来他写这个人物并没有模特儿，并不是从生活出发，而仅是出于一种“反‘四人帮’之道而行之”的愿望，以及“英雄必得相貌堂堂”的概念。我告诉他，我塑造张老师这个形象时不是这样考虑的。我脑海里涌现出来的首先不是概念，而是活生生的人。在中学里，老教师固然令人可敬，刚参加工作的青年教师也着实可爱，但真正承担最大工作量、整天在第一线钉着干的，还大多是毕业于“十七年”的“旧学校”、年龄在三四十岁左右的中年教师。他们工资不高、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在红旗下长大成人却也被林彪、“四人帮”扣上了一顶“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帽子，每当两个阶级、两条路线在教育战线激烈交锋时，他们总处在风暴、旋涡的中心，“四人帮”感到最不放心、最“危险”的，也正是他们这种“三四十岁的人”。我眼前呈现出他们熟悉的身影，耳边回响着他们亲切的语音，而且，我感到自己的脉搏也随着他们当中的大多

数而跳动，因此，我感到必须把他们写到自己的作品中去；我努力在张老师这个形象中，把他们当中最先进的那部分人的精神世界展示出来，我又从最熟悉的几位教师身上，提炼出了张老师的外貌、风度，以及那连手绢也总是叠得整整齐齐的生活习惯。从生活中的活人出发，以个性体现共性，这应当是我们塑造人物必须遵循的一个原则。

人物要从生活出发，情节也要从生活出发。这当然不是说，作品的情节应当一律是生活中实际发生过的事。有人问我：《班主任》中写到的“《牛虻》事件”和读《表》的情节，生活中是否实有其事？可以肯定地回答：生活中并没有这样两个现成的事件供我拈取。这两个情节是虚构的，但并非瞎编。“四人帮”搞文化专制主义，否定的中外古今文学作品可谓多矣，我为何单拣出《牛虻》作例？严格地谈，《牛虻》在世界文学史上并不占什么地位；但是，凡是在本世纪五十年代度过少年、青年时代的读者，恐怕大都会对这本书留有难以磨灭的印象。当时大量印行、大力推荐过这本书，它对这一代人的思想感情曾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因此，作品中的张老师面对着饱经沧桑的《牛虻》一书，从谢惠敏、宋宝琦这两个品质决然不同的下一代人口中，听到了相同的斥为“黄书”的判断，油然迸发出强烈的控诉之情，便显得真实、自然了。我把张老师设计为自己的同龄人，当年我和同伴们阅读、讨论《牛虻》的场景历历在目；我对“四人帮”扫荡包括《牛虻》在内的一切人类文明结晶的愤懑之情刻刻在心；我耳闻目睹的谢惠敏、宋宝琦这样的青年因中毒而无知的事例萦绕于怀……所以，经过一番概括、加工（丰富的想象力在这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我便设计出了“《牛虻》事件”这样一个情节。倘若我没有这样的生活感受，凭空从概念出发去杜撰另外一个情节，恐怕就不会取得现在这样的效果。读《表》的情节也是既从生活感受出发而又采取了虚构手段。我曾在“四人帮”几乎禁绝一切外国作品时，悄悄向学生讲过盖达尔《学校》一书的故事，收到了可喜的正面效果，因此我坚信凡在历史上起过革命或进步作用的作品，总还是有或大或小的教育意义的，选择恰当的篇目针对适合的问题组织学生们阅读，是很有好处的。所以读《表》这一情节的出现也并不是偶然的。

再谈谈高潮问题。有些读者对小说第七节——张老师在小公园中沉思——表示赞赏。有几位读者在来信中说，当他们读到这一节中张老师的内

心独白时，不禁感动得流下了热泪。第七节确是全篇的高潮。我写这一节时心情是极不平静的。但是也有一两位读者在来信中问：小说的高潮应当靠人物之间的激烈交锋和爆发性的强动作推上去，而你这篇小说的高潮却在几乎全然静态的无声场面中形成，这是为什么呢？我想，高潮的处理也应当从生活出发。我在构思中就考虑到，班主任这种工作的动作性不强，特别是富于戏剧性的强动作，简直一点也找不到。越过一条波涛汹涌的大河去给学生补课，几年如一日接送残废儿童上学、回家……这类特例生活中是有的，也可以提炼为典型意义的情节，并且比较容易做到在强动作中形成高潮，而且也已经有人试过。但是，小说不一定要向戏剧看齐（“四人帮”则要求一切艺术形式都要向戏剧看齐），并非离开了激烈的交锋、强烈的动作，就不能塑造出动人的艺术形象，形成令人心潮激荡的高潮（其实戏剧的高潮也未必一定要通过直接交锋与强动作来完成）。这篇小说里的那些情节，以及高潮的安排，都是从中学班主任的日常工作中提炼出来的。光明中学的班主任老师张俊石，他在一九七七年春天的那个下午，也无非是干了那么几件毫不惊险、平淡无奇的事儿。怎样才能显示出平凡中的不平凡，使人物具有感人的光彩呢？怎样把人物形象的塑造推向高潮呢？我决定废弃那种用一般化的外在动作去表现教师工作勤恳、耐心细致的手法，而是在采用尽可能精细的白描的同时，放手去展示张老师那由革命激情支配的深刻而丰富的心理活动，用以体现他善于按毛泽东思想观察、分析、思考、解决问题，体现他摒弃形而上学、运用唯物辩证法所达到的水平，以及他对党、对革命事业、对祖国未来、对民族命运的高度责任感。在第七节时，我努力展示张老师那江河奔泻般的爱憎、思考，使之形成了全篇的高潮。这种做法，按“四人帮”的标准衡量，当然是“大逆不道”，但广大读者接受了这一特别的处理方式。实践证明，小说与戏剧的确有所不同，是完全可以另辟蹊径去结构高潮的。而要想使高潮真正掀动读者的心潮，关键还在于要从生活出发，准确、深刻地表达出生活中最本质的东西。不从生活出发，任凭你呼风唤雨、大轰大嗡、要死要活、耸人听闻，终究是不中用的。

有一些读者认为《班主任》的结尾不过瘾。为什么不写出谢惠敏、宋宝琦的转变？有个读者给我寄来了改换结尾的具体方案——加第十节，写一周后宋宝琦经过耐心教育幡然悔悟，而谢惠敏读了《牛虻》也便茅塞顿

开，于是初三（三）从此书声琅琅、齐步前进。这位读者的热心令我感动，而意见却不敢苟同。道理很简单，就是生活本身虽然已经开始着手解决，但却远未完全解决宋宝琦和谢惠敏身上所反映出来的那些问题。作者不能从概念出发，去编造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医治“四人帮”给青年一代造成的内伤的工作已经开始，但是积重难返，困难还多，成效初见，却尚未臻胜境。小说以张老师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作结，似乎更能给读者以余味，促使读者去进行再创造。

许多读者建议我写续篇。我虽然已经不在学校工作了，但我仍坚持把学校作为自己的生活基地，密切地注视着、动情地体验着教育战线在抓纲治国战斗中的新进展。我知道，靠报纸上的新闻是写不出好东西来的。靠逻辑推理去写续篇更是荒唐的。我一千遍一万遍地嘱咐自己，一定要沿着毛主席《讲话》指引的道路走下去，努力改造世界观，坚持从生活源泉出发，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为望远镜和显微镜，实事求是地观察、体验、分析、表现沸腾的战斗生活，并坚持典型化的原则，努力学习、运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严肃认真地进行创作。我想，一旦生活本身有了新的飞跃，我又有了比较厚实的生活积累，那么，我会产生新的写作冲动的，那时候，张老师、尹老师、石红、谢惠敏、宋宝琦……很可能都会以自身的逻辑活跃在新的作品中，以新的面目同热心的读者们重逢。

报刊在评论《班主任》时，肯定它是百花园中的一朵香花。仔细想来，这篇小说如果不是根植在生活的泥土中，也只能是纸花、绢花、塑料花。有根花才香，有根才有生命力。我愿永远遵照毛主席《讲话》的精神，做一个有出息的文艺工作者，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争取写出新的好作品来。

（原载《人民文学》1978年第9期）

关于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艺术问题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九日在广东省文学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周 扬

这次广东召开文学创作座谈会，感谢同志们盛情地邀请我来参加。我预祝广东的文艺工作勇猛前进，取得新的更多的成就。同志们要我讲话，现在就讲一点意见，请大家指教。

我谈谈下面这样几个问题。

一 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学艺术的任务

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提出了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总任务，现在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把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宏伟的任务。这是经济、技术领域的一场大革命，也是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领域的一场大革命。

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作怎样才能适应这种形势，并把我们工作的着重点也转移到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建设上来呢？我们的文艺怎样去反映新时期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呢？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当怎样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喜群众之所喜，怒群众之所怒，表达他们内心深处的真实思想和情感，回答时代所提出的各种新的问题呢？怎样深刻地反映我国人民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斗争，勇敢地揭露这一斗争进程中的各种矛盾，激励人民同心同德地夺取新的胜利呢？为了实现这样的任务，我们首先要清除基地，扫清道路，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思想流毒和帮派残余，大力